第 50 卷 第 4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50, No. 4
2013 年 7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Jul. 2013

18 世纪英国国教会述析

李 义 中

(安庆师范学院 人文与社会学院, 安徽 安庆　246001)

摘　要: 作为国家教会,18 世纪的英格兰教会在履行宗教职责方面尽管并非无可指摘,但总体可谓称职。在相对平稳的 17 世纪末与 18 世纪前期,国教会的主流地位亦相对稳固,但来自力倡理性宗教的自然神论者的思想冲击,仍给国教会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和挑战。进入 18 世纪后期,随着社会变革的日益加深及加速进行,国教会既有的体制性和结构性弱点暴露无遗;与此同时,以循道宗为代表的福音运动的兴起及其蔓延、渗透,以及新教不从国教派、天主教派的重新活跃与日益发展壮大,则进一步动摇了国教会的独尊地位,加剧了国教会的危机。不过,主流教会的危机却并不意味着宗教的衰落,毋宁说,主流教会与其他教会或教派的起落消长,预示着的是英国宗教多元竞争的变动趋势。

关键词: 18 世纪; 英国; 宗教; 国教会

中图分类号:K 561. 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3)04-0132-08

18 世纪是英国社会变革不断趋向加速加深的时期,在这个通常以“理性”和“现代性”为标识的时代,代表主流宗教的英国国教会自然难逃遭受“理性”和“现代性”冲击的命运。面对趋于复杂严重的诸多挑战和冲击,18 世纪的英国国教会的确暴露出自身的一些弱点并渐渐露出衰微的光景,而这种情形则为当时及其后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者提供了口实。其中,一方面的批评来自于包括国教福音派及牛津运动中“书册派”在内的 19 世纪一些不同派别的宗教人士,而由这些早期批评者们所建构起来的国教会的负面形象,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几乎成了有关 18 世纪国教会的主导看法。①这种局面迄上世纪 80 年代始得以改观,随后推出的一系列有关该时期英国国教会的著述,在不回避其弱点的同时,对国教会在 18 世纪的遭遇及其表现,给予了更具肯定性的评价。②有关 18 世纪国教会及其所反映出的宗教变化趋向的另一种观点则与通常所谓世俗化理论密切关联,尽管从长期的趋势看,英国社会的世俗化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但就 18 世纪的情形而言,倘若一味依据世俗化的理论逻辑而简单地断言国教会的危机和衰落意味着宗教之在整体上趋于衰落,则难免有时代错误之嫌。事实上,就在国教会日趋衰落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国教会的危机和衰落,才给以福音运动为代表的宗教复兴运动及其他教会或教派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发展空间,不仅如此,甚至国教会自身也因深感危机的压力而被迫走上一条通过改革积弊以图重焕生机之路。就此而言,主流教会的危机并不意味着宗教的衰落,毋宁说,主流教会与其他教会或教派的起落消长,预示着的是英国宗教多元竞争的变动趋势。

收稿日期:2013-05-28

作者简介:李义中,安徽怀宁人,安庆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暨欧美文化研究所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英帝国的形成、发展及其在 20 世纪的解体”(项目批准号:11ASS001)阶段性成果;“19 世纪英国宗教多元化进程及其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13YJA770014)。

① David Hempton, *Religion and Political Cuture in Britain and Ireland: From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to the Decline of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

② Jim Smyth, *The Making of the United Kingdom*, 1660—1800: *State, Religion and Identity in Britian and Ireland*,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1, p. 171. David Hempton, *Religion and Political Cuture in Britain and Ireland*, p. 10.

一

作为国家教会,18 世纪的英格兰教会处于得享政治经济特权的独尊地位,政治上,国教会通常被认为是与国家彼此独立而又相互依赖的联盟机构,是英国宪法的基础,①国教会的主教和大主教是英国议会上院的当然成员;经济上,国教会独享国家所给予的捐赠,它还拥有征收什一税的特权,同时还成为大量俗产的拥有者。按罗伊·波特的说法,在整个 18 世纪里,安立甘教会堪称英格兰“最大且最为富有”的国家机构。② 居于这个机构顶层的是 26 位主教(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约克大主教),主教们收入颇丰,据称,到该世纪中期,一些主教的年收入超过 5,000 英镑。每位主教都分别领有一个主教堂,在各主教堂任职的其他教职人员(除主教外)总计约 1000 人左右,主教及主教堂的教士们属高级教士,他们构成了国教会的上层。其下则是分布于全英格兰的约 10,000 个教区(一译堂区),它们由教区长(rector)和教区牧师负责管理,而由于不少教区牧师系非在住(non-resident)牧师,因此,其所在堂区的日常教务便交由助理牧师(curate)处理,助理牧师收入微薄,地位低下,属于教士中的最底层。③

至于 18 世纪英格兰教会在履行其宗教职责方面的情形,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占优势的看法是,此一时期国教会及其教士们的表现整体上相当不如人意甚至非常糟糕。比如,在谈到 18 世纪英国的主教们时,19 世纪著名国教福音派人士、曾任利物浦主教的莱尔指出,主教当中的有些人“无疑是学识渊博、生活作风无可指责的仁人志士”,但他同时强调的是:“……说实话,大部分主教都是俗世之人,并不称职。”④对此,一些当代学者则并不认同,如斯佩克就认为,的确,主教中存在某些忽略其精神职责、过于俗世化、以至趋炎附势、追名逐利者,如 18 世纪初的班戈主教(Bishop of Bangor)本杰明·霍德利(Benjamin Hoadly)以及 1724—1743 年出任约克大主教的布莱克本(Lancelot Blackburne)等,但以此类个例来评判 18 世纪的所有主教,则显然是错误的。实际上,与霍德利同时的其他一些主教,如索尔兹伯里主教伯内特(Burnet of Salisbury)、卡莱尔主教尼科尔森(Nicolson of Carlisle)以及先后出任林肯主教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韦克(Wake)等人,则堪称勤勉努力、恪尽职守的典范。⑤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是在政治活动占据其相当一部分时间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的,故而显得尤为难得。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就 18 世纪的情形而言,主教们参与政治活动如出席上院会议等,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属于一种政治义务,因为其时上院的权利和影响力还很大,政府方面往往需要仰赖上院的支持才能达到特定的目的。据称,在每年议会会期内,主教们要花 6—8 个月的时间呆在伦敦,以应付议会政治之需。⑥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由于主教的任命及其升迁均由政府中的核心人物如乔治一世时期的沃波尔及后来的纽卡斯尔公爵等人所操控,因此主教们也不得不听命于政府的召唤。⑦ 这就决定着主教们不仅要履行其精神职责,同时还要承担相当繁重的政治义务,斯佩克指出,就此而言,18 世纪的主教们堪称是颇为出色地履行了加之于他们身上的双重任务。而诺曼·赛克斯则更是认为,就主教们的表现而言,18 世纪的英格兰教会可以声称其更多地应得到褒奖而不是受到责备。⑧

不仅主教们自 18 世纪以来备受其同时代人

① 参见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132 页。
② Roy Potter, *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enguin Books Ltd, 1982, p. 188.
③ Roy Potter, *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p. 188—189.
④ 莱尔(J. C. Ryle):《英国复兴领袖传》,梁曙东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 页。
⑤ W. A. Speck, *Stability and Strife*, *England* 1714 – 1760, Edward Arnold(Publishers)Ltd., 1977, pp. 94—97.
⑥ Ian R. Christie, *Wars and Revolutions*, *Britain* 1760—1815, Edward Arnold(Publishers)Ltd., 1982, p. 34.
⑦ W. A. Speck, *Stability and Strife*, *England* 1714—1760, p. 97.
⑧ W. A. Speck, *Stability and Strife*, *England* 1714—1760, pp. 96—97, 95, 96.

及后来人的责备,18 世纪其他各阶层的教士也一直受到有关他们注重享乐和物质利益、罔顾教牧职责等等的指责。① 对于此类观点,一些当代学者同样提出了异议,如斯佩克就倾向于认为,不宜只看到那些只注重享乐而置自身职责于不顾的教士,同时也应该看到那些兢兢业业、履职尽责的普通教士,斯佩克甚至强调,至于这两类截然不同的教士形象哪一种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目前尚难确定。其言下之意无非是,说不定长期以来人们对 18 世纪教士形象所做的负面描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不仅如此,他还特别提醒人们,以 18 世纪助理牧师们的微薄收入,要维持他们自身及其家庭的生存已属艰难,何谈追求过度的物质享乐,实际上,即便他们有如此想法,其收入也根本不足以令他们承受奢侈生活所需的开支。② 而戴维·亨普顿(David Hempton)则认为,大体上,18 世纪国教会的教士们在履行其职责方面,既谈不上虔诚奉献,也并非极端令人反感地玩忽职守,作为教士,他们在事业方面没多少雄心大志,但通常他们都还是尽职的。③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就 18 世纪的情况而言,社会各方对于国教会教士们在宗教方面的职责要求其实并不太高。一方面,作为国家机构的一个分支,国教会担负着维护国家稳定和社会和谐的任务,这就决定着国家和国教会上层在对各级教士提出职责要求时,会相应考虑到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现实需要,而不单是着眼于如何强化宗教或维护信仰。实际上,正是出于对 17 世纪因清教徒的宗教热情而导致内战等因素的考量,18 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国教会上层始终对宗教狂热及其后果心有余悸且避之唯恐不及,为此,他们力倡一种在宗教教义和仪式方面能够兼容并包的“宗教放任主义”态度。可以想见,从这种态度出发,国教会对于普通教士的基本职责要求自然不会太高。另一方面,普通民众因受社会商业化及后来的工业化的影响,对世俗生活的关注和投入相应增多,故而对信仰的热情趋淡,对教士在履职方面也几乎没有多少要求。例如,18 世纪一位作者在谈及该世纪 80 年代的情况时写道:“如果一位教区长在礼拜天履行了举行礼拜仪式的职责,而在有人生病时又能应约前去探视病人,则这便被视为其在履职方面是相当充分了。”④

二

晚近的有关研究表明,直至 18 世纪后期新的社会变化发生之前,英格兰教会在适应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方面一直表现良好。⑤ 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国教会从未遇到过麻烦甚或遭遇挑战,事实上,早在威廉三世尤其是安妮女王统治时期,一些高教会人士就曾针对“光荣革命”后国教会所面临的形势,发出了“(国)教会在危机中”的呼吁。⑥ 尽管当时高教会人士有关国教会危机的呼吁中不免掺杂了一些政治因素,但他们对于“光荣革命”后因“宽容法令”(1689)的颁布以及“(出版)许可证法”的废止(1695),国教会出现特权受损甚至地位动摇局面的担忧,却也并非空穴来风。就 18 世纪初期的情况看,对国教会形成挑战的已不再是新教非国教派或天主教,而是自然神论者(deists)和思想自由的提倡者们(freethinkers)。⑦ 就在“许可证法”失效不久,约翰·洛克的《基督教的合理性》(*The Reasonableness of Christianity*,1695 年)与深受洛克思想的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的《基督教并不神秘》(*Christianity not Mysterious*,1696 年)两书相继问

① W. A. Speck, *Stability and Strife*, *England* 1714—1760, pp. 97—98.

② W. A. Speck, *Stability and Strife*, *England* 1714—1760, p. 99.

③ David Hempton, *Enlightenment and Faith*, in Paul Langford edite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688—181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84.

④ Roy Potter, *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 189.

⑤ David Hempton, *Religion and Political Cuture in Britain and Ireland* , p. 2; David Hempton, *Enlightenment and Faith*, in Paul Langford edite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688—1815, pp. 83—84.

⑥ 参见:W. A. Speck, *Stability and Strife*, *England* 1714—1760, pp. 91—93.

⑦ W. A. Speck, *Stability and Strife*, *England* 1714—1760, p. 100.

世,尤其是托兰德的《基督教并不神秘》一书,更是被《英国自然神论:起源和结果》一书作者约翰·奥尔视为“英国自然神论繁盛时期”(1696—1741)到来的标志。随后不久,“自然神论书籍和小册子就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且其中大多数都引发了一些反自然神论者的回应,直到这个国家被笔墨官司所淹没。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它的信仰以及圣经还没有在此前的任何一个时期遭到过如此广泛的口诛笔伐,也没有哪一个时期产生过比 18 世纪上半叶更为卷帙浩繁的护教之作。英国变成了一个辩论场,而这个辩论的主题就是宗教。”①无疑,自然神论者之间在理论取向及具体观点上存在一定差异甚至是明显分歧,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仍有其共通之处,按约翰·奥尔的说法:“自然神论者这个术语所指称的,自始至终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承认一个造物主,但却不承认这个造物主在创世之后干涉过自然法则的运作;他们倡导一种自然的理性宗教,反对任何建立在特殊的或者说超自然启示上的宗教。”②

尽管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的一些自然神论者并不全然排斥基督教,但当他们将理性引入宗教神学和哲学时,其结果则必然导致对诸如基督教之类实定宗教的否定,如同詹姆斯·C. 利文斯顿所说:“17 世纪末期和 18 世纪早期的大多数自然神论者都力图表明,上帝的完善性,必然意味着一种对全人类开放的拯救之路,而局限于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人群的实定性(历史性)启示,则缺乏普遍性。真正的宗教,应该是人类的自然理性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同样容易接近的。”③显然,自然神论者的主张已从根基上威胁到基督教之类“实定性(历史性)”宗教的生存,而当那些以超自然启示为依托的实定宗教受到攻击时,附着于这些教会的教士们也就自然难逃被攻击的命运了。自然神论者推崇理性,他们争辩说,理性是宗教信仰的唯一仲裁者,而诸如三位一体教义以及圣经中有关奇迹的种种记述,因其与理性不一致,故只能成为信仰的绝对障碍。④ 而一些更为激进的自然神论者如马修·廷德尔(Matthew Tindal)、安东尼·柯林斯(Anthony Collins)等人,则大张旗鼓地主张反教会与反教士主义,他们将基督教之类“启示宗教”(revealed religion)视为教士阶层出于自身权力和利益考虑而强加于世界的伪信仰体系;并用“教士的阴谋”(priestcraft)之类最具轻蔑意味的词汇对教士阶层大张挞伐。⑤

面对自然神论者的攻势,国教会被迫动员各种力量以尽力做出回应。1736 年,达勒姆主教约瑟夫·巴特勒(Joseph Butler)发表《宗教类比》(*Analogy of Religion*)一书,通过将自然神论者所推崇的自然宗教与作为启示宗教的基督教进行对比,巴特勒“以有力的前后一致性证明:自然宗教绝不因为完全合理而拥有比基督教启示优越的特权地位。比起圣经启示的完善性来,自然的完善性绝不更明显一些。信仰作为自然创造者的上帝,也就要求把种种或然性或可能性集中起来,作为对基督教启示上帝的信仰。”⑥自然宗教与启示宗教一样,各有其不完善之处,既如此,则两者之间自应相互支持,而不应彼此攻击。⑦ 至此,在 18 世纪初国教会与自然神论者的激烈论战中,国教会终于因着巴特勒深刻而有力的理论回应而占

---

① 约翰·奥尔:《英国自然神论:起源和结果》,周玄毅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37、139 页。

② 约翰·奥尔:《英国自然神论:起源和结果》,第 9 页。

③ 詹姆斯· C. 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从启蒙运动到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上卷,何光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1 页。

④ W. A. Speck, *Stability and Strife*, *England* 1714—1760, p. 100.

⑤ W. A. Speck, *Stability and Strife*, *England* 1714—1760, p. 104.

⑥ 有关巴特勒著作及其观点的深入讨论,参见詹姆斯·C. 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从启蒙运动到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上卷,第 92—100 页。

⑦ W. A. Speck, *Stability and Strife*, *England* 1714—1760, p. 104.

了上风。此后①,自然神论声势渐趋减退,但其思想影响仍持续存在。②

很大程度上,作为国教会与自然神论者之间争论的突出后果便是,"宗教淡漠"(religious indifference)在各种不同的教会与教派信徒中呈日益增长之势,而这种情形在当时的上层阶级中则表现得尤为突出。其所以会产生如此后果,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在国教会与自然神论者的论争中,巴特勒主教实际上是将自然宗教与启示宗教等量齐观,即是说,使双方都处于一种因各自存在的不完善性而同样易于受攻击的地位,才使得自然神论者不得不在巴特勒著作的理论锋芒及其潜在威力面前主动退却;但与此同时,从正统教会的立场看,巴特勒的胜利却是以很大代价换来的:当巴特勒将自然宗教与启示宗教置于同一地位时,实则意味着启示宗教本身也并非无懈可击。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自然神论与正统神学之间的论争当中,双方都算不上真正的赢家。进而言之,既然不论是历史性的启示宗教抑或是自然的理性宗教都只能立足于"或然性"的根基之上,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和必要去在宗教问题上过分执着呢?或许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宗教淡漠情绪在社会各界尤其是上层阶级中蔓延开来。据1750 年的一篇布道词称,"大多数富人和大人物们(不仅)从不经常出入上帝的教堂……而且还把向上帝祈福讥讽为迷信"③。把这种现象与 17 世纪清教徒们的宗教热情抑或天主教会之注重仪式等等相比,称之为"宗教淡漠"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上层阶级中普遍流行的"宗教淡漠"情绪也与 17 世纪末即已在国教会上层中出现的"宗教放任主义"(latitudinarianism,一译宗教自由主义)态度密切相关。④ 宗教放任主义可以看成是对诸如 17 世纪发生在清教徒当中的宗教"狂热"(fanaticism)⑤情绪的一种反拨,在人们的记忆中,宗教狂热曾经给这个国家带来长期而巨大的痛苦和灾难,为避免悲剧重演,"光荣革命"后的国教会上层如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蒂洛森(John Tillotson)等人开始倡言宗教宽容,主张在宗教教义及形式方面抱持开放与中庸的态度,反对任何形式的宗教狂热。⑥ 事实上,这种态度说到底便是对宗教问题采取一种较为理性与宽和的态度,就此而言,17 世纪末开始出现于国教会上层的宗教放任主义,不啻为随后到来的自然神论的"繁盛"大开了方便之门,而蒂罗森大主教本人甚至也被归入"理性的超自然主义者"亦即理性宗教的倡导者之列。⑦ 有意思的是,随着自然神论的兴盛,而国教会则忙于应付自然神论者的攻击时,宗教放任主义又进一步成为国教会主要护教者当中占优势地位的态度和立场。⑧ 于此可见,在宗教放任主义与自然神论之间,存在的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敌对关系,同时更有某种因双方都看重理性(尤其是理性地对待宗教)而使得理性地对待宗教问题这一态度和观念,愈益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几乎整个 18 世

---

① 有关对自然神论的回击,詹姆斯·C. 利文斯顿指出:在由马修·廷德尔(Matthew Tindal, 1655—1733)所著、被称为"自然神论者的圣经"的《基督教与创世同样古老》一书于 1730 年出版之后不久,"自然神论本身就在两条战线上面临着摧毁性的进攻。一方面,有巴特勒主教等正统捍卫者,他们力图揭示自然宗教的信仰中有种种难题,从而提高了对启示的信仰,在另一个侧翼,则出现了怀疑主义大师大卫·休谟。"而"休谟的著作将证明是对理性宗教最后的致命打击。"参见詹姆斯·C. 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从启蒙运动到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上卷,第 41、48 页,第 103 页。

② Ian R. Christie, *Wars and Revolutions*, *Britain* 1760—1815, p. 35.

③ W. A. Speck, *Stability and Strife*, *England* 1714—1760, pp. 103—104.

④ W. A. Speck, *Stability and Strife*, *England* 1714—1760, pp. 99—100.

⑤ 在 18 世纪的语境中,人们更经常地用 enthusiasm 一词来指称宗教狂热现象。参见 W. A. Speck, *Stability and Strife*, *England* 1714—1760, pp. 104, 105.

⑥ Roy Potter, *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 186.

⑦ 参见詹姆斯·C. 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从启蒙运动到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上卷,第 25—28 页。

⑧ W. A. Speck, *Stability and Strife*, *England* 1714—1760, p. 104.

纪里,宗教放任主义之得以畅行,作为国教会对手的自然神论者亦可说是功不可没。

三

如果说 18 世纪前期,国教会尚能勉强适应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那么,此后,面对进入快速变动时期的英国社会,国教会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甚至无所适从了。在 18 世纪后期的诸多变化当中,首先且最为明显的表现便是英国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人口分布状况的重大调整;而由于同期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起步并不断取得进展的时期,由此而导致诸多变动因素之间发生相互作用与影响,使情形变得更加复杂难解。据统计,1750 年时,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从 1700 年的大约六百万上升为六百五十万左右,半个世纪里总人口仅增加五十万;但随后人口增长明显加快,自 18 世纪 60 年代起,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呈加速增长态势,1801 年,英国首次正式的人口调查表明,当年英格兰的人口总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870 万人,短短五十年间,英国人口增加了二百余万。与此同时,大约从 1750 年开始,人口出现向北向西移动的趋势,原先人口稀疏的西部北部地区,日益成为人口集中的新兴工(商)业地区。① 人口激增以及人口重心的转移,与此同时更兼有工业化和城镇化之夹杂其间,使英国原有的教区建制以及教区划分立即暴露出其完全不足以应对新形势要求的弱点,例如,1750 年时,曼彻斯特人口已达 20, 000,却只有一座国教会教堂;1800 年时,马里波尼(Marylebone)计有人口 40,000 之众,但却仅有一座 200 个座位的国教会教堂。迟至 1812 年,伦敦所拥有的国教会崇拜场所总数为 186 个,而新教非国教派的崇拜场所则达到 256 个。② 由于增设教区及增加教士数量就会相应减少现有教区和教士的各项收益,且需要专门立法,因此,这一问题直至 19 世纪才逐渐得以改善。于是,18 世纪晚期基层教区的一个突出问题便是非在住教士的大量存在,据晚近的一份研究材料估计,1780 年时,36% 的国教会教士系兼职教士,仅有 38% 的堂区拥有在驻牧师。③ 另据伊恩·R. 克里斯蒂(Ian R. Christie)所说,1809 年,在总数为 11,194 名领圣俸的教士当中,就有不少于 7,358 人系非在住教士,而一些地方性研究则表明,在 18 世纪的一些时段,非在住牧师的数字可能更高。至于出现堂区教士不常驻教堂的原因,当事教士往往以身兼学校教师或大学的研究员、或身为达官贵人的私人牧师抑或大教堂的教士成员等作为借口或理由。④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教士(包括助理牧师)兼职现象实际上也与俗人控制圣职推荐权这一体制性问题密切相关,据称,在 18 世纪的英格兰,大约 50% 的圣职推荐权掌握在私人手中,而由于这些人往往不一定从实际需要出发而是根据个人喜好甚至个人利益来选择教士,由此而难免导致教士兼职现象的存在。不仅如此,近期的有关研究还表明,教士兼职现象不只是因为俗人推荐权的大量存在以及一些教士的贫困所致,甚至当圣职推荐权从俗人转归教士之后,也依然存在。⑤

较之于经济、社会变动所带来的冲击,对国教信仰及国教会地位造成更大冲击的则是非国教各教会及教派力量的增长及其在宗教和政治方面的日趋激进,以及由卫斯理等人所领导的福音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就各非国教派别的情况看,大致说来,新教非国教派包括长老宗、公理宗、浸礼宗以及贵格会(Quakers),在 18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教派多倾向于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开展活动,成为各自独立甚至有些排外的信众团体,对国教会的特权地位采取默认的态度,也不太注重从组织上发展自身。正如 E. P. 汤普森所说:"它们在光荣革命后经历了相同的发展趋势,随

① 参见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楩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280—286 页。

② Roy Potter, *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p. 190—191.

③ David Hempton, *Religion and Political Cuture in Britain and Ireland* , p. 5.

④ Ian R. Christie, *Wars and Revolutions*, *Britain* 1760—1815, p. 34.

⑤ David Hempton, *Religion and Political Cuture in Britain and Ireland*, p. 5.

着迫害日益减轻,宽容日益扩大,教徒们的热情日益减少,财富逐渐增加。”①不过,至 18 世纪晚期,新教“不从国教派”在政治和宗教信仰方面所表现出的消极和淡漠态度开始发生改变。一方面,各种老的非国教派受社会政治变动与各种宗教思想及宗教运动的影响,开始在宗教和政治方面有所变化或有所行动。其中,长老宗受索齐尼主义(Socinianism)的影响较大,部分成员因而愈来愈明确地追随理性,反对三位一体等神秘教义,成为一位论者。浸礼宗和公理宗则受到国教会内外福音派的影响,而公理宗所受影响尤著。福音派不仅为这两个教派提供了一些热衷于信仰的教徒,同时也使其原有的加尔文主义信念在福音主义的影响下逐渐淡化。两派的教徒人数开始增加,但具体数目难以确认,据认为,迄 1811 年时,新教非国教徒与卫斯理派循道宗教徒加在一起,其总数大概占到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的 1/10。随着教徒人数的增加,三大教派开始寻求在政治上采取行动,以图解除加之于他们身上的一些法律限制。② 另一方面,则是新的非国教派的出现。先是公开否认基督神性和三位一体教义,强调上帝位格单一的一位论派(Unitarians)的声势渐壮。18 世纪初,一位论思想只是在少数教士中存在,到该世纪末,一位论派则已成为一个公开宣示其主张的少数派了;同时,该派的信徒人数日益增加,尤其是在像科学家、出版商、作家、改革人士、教育界人士等职业人士中拥有大量信徒。③ 至 18 世纪末,由卫斯理所领导的福音运动则在卫斯理去世之后不久,于 1795 年脱离国教会形成了独立的循道宗。一位论派的声势和影响增加与循道宗的形成,使不从国教派的队伍得以壮大,也为之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到 18 世纪后期,随着天主教徒处境之逐步得以改善,其在苏格兰、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数从 1700 年的大约 8 万人上升到 1778 年的大约 11 万人。④ 此后,随着爱尔兰移民的大量涌入,天主教徒的人数更是有了明显增加。

与非国教各教会或教派重新恢复活力、力量不断壮大的势态相比,另一股来自国教会内部的宗教复兴浪潮似乎声势更大。本来,卫斯理等人的目的“只是要在教会中恢复真正的宗教,使流落在外的广大群众归向教会”。⑤ 但循道派之诉诸人们尤其是下层民众的宗教情感,它之强调个人转化、重生、悔罪、虔信等,及其采用户外布道、俗人布道、巡回布道的方式以及建立自身组织机构等做法,从一开始就注定其不为国教会内部主流观点所接纳。在如此情势之下,不难想见,随着运动的不断向前推进,循道派与国教会之间的距离势必会越拉越大,最终,在卫斯理去世之后的 1795 年,循道派从国教会中分离出去。

循道宗的成功固然得益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但它的成功与工业革命之在时间上的重合却颇具历史深意。如果说,卫斯理的组织、管理能力及其在传教方式上的诸多创新等等构成了卫斯理运动成功的主观因素,那么,18 世纪中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则成为推动卫斯理运动迅速发展的最有利的客观因素。面对工业化和城镇化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国教会无法也不愿迅速做出有效反应。相反,“卫斯理兄弟使传道活动面向城市和大市镇的群众,以及矿区,因为这些人一向为教会所忽视,不关心宗教,往往还道德败坏,酗酒习以为常并成为越来越严重的恶习”⑥。1741 年之前,卫斯理的活动中心在英国南部和西部地区,以伦敦、布里斯托尔和金斯伍德为中心。不久,随着米德兰及英格兰北部地区日益成长为新兴工业中心,卫斯理的传道活动迅速转向这些地区。处于社会边缘、一向为国教会所忽视的穷苦工人们热情地欢迎卫斯理及其差派的传道士,诚如汤普森所言:“循道派打开教堂的大门,为工业革命中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了某种团体,以取代正在瓦

①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 页。

② Ian R. Christie, *Wars and Revolutions*, *Britain* 1760—1815, pp. 38—39.

③ Roy Potter, *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 197.

④ Jim Smyth, *The Making of the United Kingdom*, 1660—1800, *p*. 189.

⑤ G. F. 穆尔:《基督教简史》,郭舜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286 页。

⑥ G. F. 穆尔:《基督教简史》,第 285 页。

解的旧社团模式。"①可见,工业化时代并不缺乏宗教需求,缺的只是因应这种精神需求的意愿和能力。

仅就规模而言,迄18世纪末,循道宗仍然只是诸多教派中一个较小的派别,1791年,整个不列颠诸岛的循道派信徒仅为72,000人。然而,循道宗的影响却大大超越了其规模,随着卫斯理领导的福音运动的不断取得进展,受其影响,大约自18世纪70年代开始②,英国国教会内部也出现了一批具有循道派气质、追求灵魂拯救、热情虔信的"福音派"③,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时,国教福音派已拥有300—500名身为国教会教士的忠实支持者,其在出身上层阶级的国教会平信徒中也正在形成有效影响,如以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亨利·桑顿(Henry Thornton)等为代表的"克拉潘教派"(Clapham Sect)即是显例。④ 不仅如此,卫斯理的宗教热情也对新教非国教派乃至英格兰境内的天主教徒产生了较大冲击,自18世纪70年代起,诸如公理宗和浸礼宗这样的新教非国教派重新恢复其活力和热情,"新不从国教派"(New Dissent)开始将目光对准快速增长的工业地区的工匠们,在他们当中发展和吸收成员,其中,公理会教徒由1750年的15,000增加到1800年的35,000人,同期浸礼会中的特选浸礼会派(the Particular Baptists)成员则由10,000人增加到24, 000人。⑤

一面是国教会的危机和衰退,一面则是非国教各教会及教派的日趋活跃与不断壮大,18世纪末英国宗教生活中呈现出的如此场景,预示着的则是英国宗教多元竞争时代的前景。1851年英国首次宗教调查结果显示,英格兰地区参与教堂礼拜仪式的各新教非国教派信徒人数(不包括天主教徒)已近乎占到当日参加教堂礼拜仪式的信众总数的一半,至此,国教会尽管依然处于国家教会的传统地位,但它已只是宗教多元竞争态势中诸多参与其中的教会之一而已。

On the Church of England in the 18th Century: A Perspective of Religious History

Li Yizh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001, *Anhui*, *China*)

Abstract: In the 18th century, the Church of England as the state church might be said to have performed its religious role dutifully, although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it also had some defects in carrying out this role. In the relatively steady period of the late 17th century and the first half of the 18th century, the ascendancy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seemed to be stable, but some impacts from deism and deists brought big pressures and challenges to it. When ente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8th century, the Church of England manifested its institutional and structural defects, as the social changes became more profoundly and speedily,. Meanwhile, the rise and spreading of Methodism, the growth of the Dissent and Catholicism, further shook the given position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and brought some crises to it. Nevertheless, the mainstream church's crises does not mean the decline of religious decline in general, rather, the rise and fall of mainstream church and other marginal churches do indicate a tendency of religious pluralism in the coming days.

Key words: 18th-century England, religion, the Church of England

(责任编辑　管　琴)

① 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第440页。

② Roy Potter, *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 192.

③ 通常以英文首字母大写(Evangelical),以区别于卫斯理宗福音派。

④ Ian R. Christie, *Wars and Revolutions*, *Britain* 1760—1815, pp. 35—36.

⑤ Roy Potter, *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p. 197—198.